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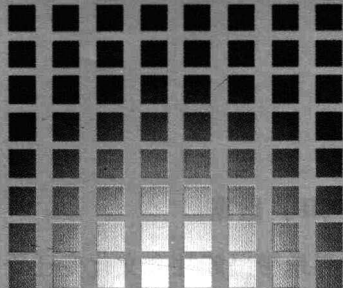
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 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丹噶尔藏人为视点

DUOWEIMINZUWENHUABIANJIEDIDAI
MINZUSHEHUIWENHUABIANQIANYANJIU
——YIDANGAERZANGRENWEISHIDIAN

李臣玲 贾伟 著



民族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百所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LANZHOU DAXUE MINZUXUE JINGXUANWENKU

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 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丹噶尔藏人为视点

李臣玲 贾伟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以丹噶尔藏人为视点 / 李臣玲, 贾伟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

(兰州大学民族学精选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10617 - 2

I. 多… II. ①李…②贾… III. 藏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湟源县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169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 //www. mzchs. com](http://www.mzchs.com)

北京金若龙公司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总编室电话: 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117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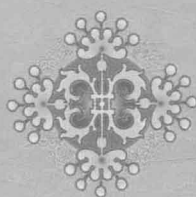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90 千字

ISBN 978 - 7 - 105 - 10617 - 2/K · 1897

(汉 1033) 定价: 39.80 元

兰州大学“985工程”建设项目



编委会主任：杨建新

编	委：	马曼丽	王希隆	王洲塔
		徐黎丽	赵利生	李 静
		杨文炯	武 沐	切 排

序

杨建新

兰州大学走过了一百年的峥嵘岁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成立也快十年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出版这套文库，献给哺育我们成长、关心我们工作的兰州大学和兰州大学的全体师生。

民族学在兰州大学只有十多年的历史，与许多兄弟学科相比，他只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因此他曾被忽略过、轻视过，不过这个有极强活力的生命，终于还是在兰州大学这块沃土上坚强的成长起来，为自己争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至今，兰州大学的民族学已经是博士学科一级授权点，拥有五个二级博士点，同时是国家重点学科。作为民族学科的载体，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成长壮大，成为在国内小有名气的科学研究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的研究型实体。

不到十年的岁月里，在中心的老师们辛勤耕耘下，仅由中心老师及他（她）们指导下写出的民族学专著就达八十多部。现在摆在您面前精选出的这套文库，就是这些年来，中心师生用知识、智慧和汗水辛勤浇灌出的部分成果。当然，“精选”者，仅指从上述八十多部专著中精心选出者之谓，并非一定是精品。但是我们有信心，经过我们的扎实工作和潜心研究，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精品问世。

借本文库出版之际，还想就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发展，说一些心得和体会。

民族学（Ethnology）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学术界时，初译为“人类学”、“民种学”。至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先生始将其译为“民族学”。这一译称虽不完全符合希腊文的原意，也没有紧扣该学科在西方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民族学”这一译称，却十分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古代虽无“民族”一词，但中国古代用于表达民族共同体的“族”一词的含义，已具有“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轮廓。中国古代的“族”，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发育充分，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拥有鲜明的诸多共同因素。而且“民族学”作为一种学科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时期，民族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社会稳定、领土完整的大事。民族问题，从清末以来就与社会稳定、边疆安全、抗击外国入侵问题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因此这一译名一出现，立即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名称。

至今，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仍有密切关系，而且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学就是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与一些发达国家的“民族”、民族问题和“族群”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中国民族学在研究中已经凝练出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主导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在运用从西方传来的“民族学”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密切与中国的民族实际相结合，逐步创建和成长出了中国化的民族学。民族学在中国流行百年的历史，就是民族学中国化的过程。

民族学这门学问在中国，其基本学术概念就是“民族”，他就是研究民族这种共同体及其发展的一个学科，不研究民族，他在众多的学科中就没有地位，也就失去了他存在的价值。他的基本任务，是研究和揭示民族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他是一门科学；民族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民族这种特殊人们共同体构成的诸要素，揭示这些要素在民族共同体中的发展、变化、作用、相互联系及其运行机制；民族学当然还要研究和揭示每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及其具体发展规律。中国的民族并非仅仅是文化群体，而是一个与政治密切相连，关系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诸多因素的群体，研究他必然涉及众多的学科，因此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

民族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民族学即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中国民族学与国外民族学，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民族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研究传统、研究视角等方面，继承和吸收了大量国外民族学的优良成果，同时，中国民族学又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主要表现在下列五方面：

1. 在指导思想方面，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放眼中国和世界民族、民族问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充分反映和吸收世界民族学发展的优秀思想和最新成果，促进中国和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发展。

2. 在内容方面，以中国民族学和民族问题为基本内容，构建符合中国和世界民族新发展的知识体系。

3. 在方法方面，采用实证的、思辨的、比较的、综合的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结合，描述与分析综合结合，田野与文献结合，充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民族学研究有更加广阔的道路。

4. 在视角方面，认为民族是一个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及种族、生物等各种因素的群体，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群体，全方位研究揭示民族的各个方面，是民族学的显著特色。

5. 在思想传统方面，继承中国古代对民族实体、民族关系、民族问题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认识，吸取中国历史上处理和对待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经验、政策和方法，使民族学在具有数千年多民族共处历史以及积累了深厚传统民族思想的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发展。

具有这样一些特色的中国民族学，既是当前广大中国民族学者的研究实践，也是多年来中国民族学界的主流愿望。

本文库的出版，就反映了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想在推动民族学中国化，创立有中国特色民族学方面做些工作的强烈愿望。

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2009 年 4 月

文化变迁是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由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刚刚从哲学、历史学中分化出来，当时的学者只关注人类怎样从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进步，不去关心文化变迁这一内容。到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虽然一些社会家和人类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社会文化进化的规律，但是，当时的他们多用进化一词，很少使用甚至不用文化变迁这一概念。到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由于反进化论思潮的兴起，人们才放弃简单的文化进化论而改用文化变迁这一词。但是不同的学派，对于文化变迁一词的阐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德国的文化圈学派看来，文化变迁是指各种文化现象的转移；英国文化传播学派的著作中，文化变迁则指各种民族文化的迁徙浪潮及其相互融合、涵化；美国历史学派则经常使用文化变迁一词，但用法多变，有时用社会变迁，有时用社会和文化变迁或社会文化变迁；英国的功能学派把文化变迁称之为文化过程、文化转变等。在我国，孙本文先生把文化变迁看作是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变化。^①

文化变迁的定义虽然名目繁多，但是，一般而言文化内容的增减所引起的文化体系结构性变化，都可称之为文化变迁，即文化内容的整体结果性变化。

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为人们所认同的、有别于过去的文

^① 孙本文先生关于文化变迁理论主要反映在其专著《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商务印书馆 1944 年修订版）。另外，在其《社会变迁》、《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及《文化失调与中国社会问题》等论著中，也都有所阐述。

化形态。在文化变迁中,包括了时间、变迁的条件、人们的认同结果等诸方面的因素,以及变迁的过程,即内外部因素与原有文化的整合过程。缺少了这些因素,文化的变迁便不能成立。因此文化变迁是一种综合因素的结果,而不是一事一物的变化。应将文化变迁与文化变化加以区别,局部的、未能引起文化的系统整合的变化,称之为文化变化,它是有别于文化变迁的。但是,无数这种文化局部的变化的积累,也可使文化的很多方面受到改变,也可以造成文化的变迁。这些因素不在于大小强弱,而在于这些因素对一个社会特定的结构与状态所能引起的整合的程度如何。”^①

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文化变迁主要指文化环境现象的变化,如文化特质、文化模式、文化风格等的演变;而社会变迁主要指社会环境现象的变化,如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及社会生活等演变。但是,由于整个人文现象中有些既是文化内容,又是社会参数,如组织形式、文化制度等,在其很难分开的时候,一般可称之为社会文化变迁。社会文化变迁对于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有着积极意义,并且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的发展。

研究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有着深远的意义。社会文化最大的特性在于它的变更性和发展性,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动因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量。同时文化的传播、科学技术发明的创造以及战争、人口迁移、瘟疫流行、自然环境改变等,也同样会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发生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因素对社会文化变迁是交互发生作用的,往往是以一种综合形态呈现。社会文化变迁的类型很多,如自愿变迁与强制变迁、有限变迁与无限变迁、自然变迁与有计划变迁、文化突变与文化渐变等。因此,透过某一民族社会文化变迁进程的研究,既可以展现出该民族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其未来,也能揭示其发展脉络和规律。同时,还能为促进该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支持。因此,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成为民族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渗透中实现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不仅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变迁的进程不完全一样,而且其转变方式也“因地”、“因民族”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即便是同一民族,由于受到自

^① 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20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其文化变迁的方向、内容、程度、频率等都是不尽相同的。以文化变迁理论来看，民族文化变迁最为激烈、程度最深的区域是多民族文化的边界地带，因为这里往往又是多维民族文化交汇区域。多维民族文化交汇是指在一个区域或某个民族群体系统内，同时存在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几种独立的民族文化。他们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是他们的发展模式。多维民族文化交汇区域往往是多种民族文化争奇斗艳的地界，也是多种民族文化彼此相融的“熔炉区”。因此处在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在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其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呈现与众不同的特质。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有差异的，有差异就难免会产生矛盾。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化”的民族国家，每个民族、每种文化之间都存在着相对的差异，这种差异分为自然性差异和社会性差异。自然性差异是指“与生俱来”的差异，社会性差异是由于在后天的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不平衡或不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性差异往往会导致社会性差异，而社会性差异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如果处理不当，也难免会使某个民族的发展失去和谐，出现种种矛盾，成为该民族社会发展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如何解决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问题，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之一。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我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这是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也是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努力的方向。在这一蓝图中，如何构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和谐民族社会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术工作者所应该致力研究的课题，这也是笔者一直对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文化变迁所关注的主要动因。

笔者生活在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交汇较为突出的青海民族地区，对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有着更为直观的认识和更多的思考，并将有意进一步深入探索。但是，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得民族间交流互动更为广泛，民族文化边界交错纵横，在西北尤其如此，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使得资料调查和收集的工作量之巨大难以估算，令人望而却步，成为了进行更深层次专门研究的现实障碍。于是，典型性的个案研究就成为了较好的选择，筛选具

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社会文化变迁研究的视点，进行综合研究，举一反三，以点代面，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个案研究的意义往往在于超越个案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思路经常由于个案选择的缺乏典型意义而被人诟病为缺乏代表性，不足以作为立论的根据。基于此，几经思考和对比，笔者选择了青海“丹噶尔藏人”为研究课题的切入点^①，并依据文献和现今丹噶尔藏人主要集居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藏族乡的现实，选择日月藏族乡为调查点。

“丹噶尔”(sTong-vkhor, 藏语意为“千户”)即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因该地有著名的黄教寺院东科尔寺(又名洞科尔, 建于1652年)而得名。“丹噶尔”即“东科尔”之异译, 简称丹地。对于丹噶尔的藏人当地其他民族的人不称其为藏族或藏人, 而是沿袭过去的称呼, 称之为“家(又作假、嘉)西番”, 他们对此称呼也予以认同。“西番”是宋以来对甘青一带少数民族的泛称, 明朝以后专指藏族。史志中对此多有记载, 《丹噶尔厅志》云: “南乡一带克素尔, 兔尔干各庄, 有西番住屋耕田者, 名曰东科尔佃户, 与汉民杂居, 间有读书者, 土人称为‘家西番’, 即熟番也”。^②《青海省湟源县风土概说调查大纲》之《关于种族户口》中记载: “种族种类汉、回、蒙、番四族杂居。各族住地, 汉、回两族住县境德属地; 其蒙、番两族多系游牧口外, 时来时去, 常年居住内地者, 极形寥寥。”^③《湟源县社会调查集》中记载: “(湟源)熟番, 俗称‘家西番’, 已定居, 主要以农为住, 多居本县南乡一带。”^④《湟源县志》中记载: “宋元时称吐蕃, 驻牧湟源, 明末渐次开垦, 牧而兼耕, 清代多数为东科尔佃户, 称‘家西番’”^⑤。而今的“家西番”大多是指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湟中、大通县等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藏族。本文所讲的丹噶尔藏人即是家西番之一部, 丹噶尔自古为家西番主要聚居区。综合史志记载, “家西番”一词最初来源即是

① 丹噶尔藏人的人文现象中既有文化的内容, 又有社会的参数, 很难将它们分开, 故把社会和文化两者的变迁和为一体进行综合研究。这与我们一直认为的社会文化变迁是“一种综合因素的结果”的观点相一致的。

② (清)杨治平:《丹噶尔厅志》卷6《人类》, 316页,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③ 湟源县政府编:《青海省湟源县风土概说调查大纲》,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手抄本。

④ 湟源县志办公室:《湟源县社会调查集》, 1968年10月编, 油印本。

⑤ 湟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湟源县志》, 605页,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对丹噶尔藏人的描述和称呼的，最后推而广之，成为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质的农耕藏族的通称。那么何谓“家西番”？学术界依据历史纪录及该族体的风俗习惯有多种解释：第一种认为，藏语称呼汉族为“家”，所以“家西番”指的是藏化的汉族；第二种解释与第一种恰恰相反，认为“家西番”指的是汉化了藏族；第三种认为，“家西番”指“东科尔家的西番”的简称，即东科寺属民的简称。关于家西番的族属，究竟是汉族还是藏族学术界也有争论，但是从历史文献《丹噶尔厅志》、《湟源县志》等的记载，结合现今“家西番”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服饰、语言等的调查资料以及本民族的认同可以断定，“家西番”的族属是藏族确定无疑。据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洲塔教授考证，丹噶尔的“家西番”是宋代唃廝囉的后裔。

丹噶尔藏人由于处于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具有鲜明的地域亚文化特征和强烈的民族文化融合性：既有当地藏族的文化特性，又有当地汉族的文化风貌。即文化性格中多维民族文化交汇的特性比较突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丹噶尔藏人所处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特殊性所致：第一，丹噶尔藏人所处的人文环境是长期处在汉、藏文化和农、牧文化交汇之地；丹噶尔藏人所处的自然环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交界、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结合处，具有两大高原的一些共同的特性，为操持各种生计方式的民族来此定居提供了一定的生态条件，迁徙而来的各民族都能找到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小环境。丹噶尔位于青海省最为宽延平坦的湟水谷地之中，湟水中流，灌溉便利，从事农耕的自然条件优越。因此，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可以居住在河流的两岸；谷地四周山地是从事牧业生产民族的天然牧场，可以将成群的牛羊放牧于青山绿水之间；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农、牧业经济的交汇；历史上，丹噶尔一直属于边陲之地，为交通要道，是“唐蕃古道”的要塞，“丝绸南路”的要冲，内地联系西藏的“海藏通衢”、“西藏总隘”。无论是西出边关，还是东进关陇，或北上河西诸郡，或南下青南，都不能不经过丹噶尔。如此特殊的交通地位和地理位置，为有经商传统的民族穿梭于农牧之间提供了可能。总之，丹噶尔为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提供了适合他们的生存环境，为多维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客观条件，使得各民族文化经过长途跋涉之后仍能在这块新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第二，从丹噶尔藏人所处社会文化空间构造的特殊性来看：经过漫



长的历史演变，到了明清时期丹噶尔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藏传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教文化圈。在这三大具有不同文化内涵文化圈的造就和影响下，不同的民族，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汉族属于儒家文化圈，回、撒拉族等民族属于伊斯兰文化圈，藏、蒙古、土族等民族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而且这三大文化圈既是文化概念，又是地域概念，不同民族既属于不同文化圈，同时也属于不同的地域。不容置疑，属不同文化圈的各民族间，不但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不同，而且文化特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异性难免会造成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斥，即对他文化产生本能的防范和排斥。同时，各文化圈的社会区域处于相对封闭的“板块化”，各文化圈之间缺乏相应的互动和联系；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使民族个体间产生了心理上的隔阂，彼此间缺乏主动的交流与沟通。但是丹噶尔确实给世人展现出了一个开放性社会的一面，这里是各个文化圈的文化边缘，也是交汇地带，呈现出文化势力均衡的格局，并且生存意义高于一切，尽管历史的遗留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实际生活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之间彼此相依，共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合力促进下，丹噶尔既培育了以牧业经济文化类型为主的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等，同时也养育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汉族文化、土族文化、回族文化等。

这里优越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促进了各种民族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汇聚，为多种民族文化的交融搭建了平台，丹噶尔藏人与周边民族之间长期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或者说是一个趋于开放的丹噶尔藏人社会。在这样的社区中，操持不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共同生活其间，互通有无，朝夕相处，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彼此互补的关系。经过长期的融合发展，使丹噶尔各民族文化在发展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同时，更多的则是彼此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在这个多维的文化空间里，由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民族分布格局的多维一体，民族人口“相对规模”之间的差异，深层次的族际通婚，生产方式的变化，大众传媒的普及等原因，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全方位、立体的，吸收了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所发生的变迁。正如《湟源县风土调查录》中记载那样：“（湟源）五族杂处，除大部分均系汉族，城关多杂回；东南

乡多系番族，其风俗多染汉风，正在同化时期，邑人称为‘家西番’”^①。

丹噶尔藏人社会具有明显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兼而有之的双重性文化特色：一方面具有一般农村社会所共有的乡村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游牧文化的特质。如，生活在该社会中的藏人，在他们身上既保持有藏族传统文化的特性，又拥有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文化的印迹，因此，可以将丹噶尔藏人的文化视为多重文化性格的典型，是多种民族文化相交融的“糅合体”。这种文化现象不是丹噶尔藏人所独有的，放置于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地区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脉络，就是丹噶尔藏人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也是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因此，通过系统研究可以为解决在新时期，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个体民族文化如何和谐共生，如何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负面效应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启迪。另外，通过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如何调适、变迁等诸多问题，进而总结规律，研究对策，概括出当前其他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为国家“构建和谐民族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素材依据和理论支撑，对促进当今民族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故而，以丹噶尔藏人作为视点研究多维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以点概面的折射出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图景和规律，无疑具有较明显的典型性和较强的说服力。

自2004年以来，笔者展开了对丹噶尔藏人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然而以往的研究成果少，资料缺乏。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相关资料来看，除了方志和20世纪50年代的部分官方调查资料外，其他可用资料无几。以丹噶尔为纪录主体的文献资料主要是清末修撰的《丹噶尔厅志》，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手抄本《湟源风土调查录》，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的《湟源县风土概况调查大纲》，1968年湟源县志办编撰《湟源县社会调查集》，由湟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撰，1993年出版的《湟源县志》等，此外，乾隆年间修撰的《西宁府新志》和光绪年间修撰的《西宁府续志》以及《安多政教史》也有涉及，但内容不多。现代也有些研究成果，如崔永红等主编的《青海通史》，蒲文成著《青

① 《湟源风土调查录·种族》，湟源县知事民国十五年手抄本。

海藏传佛教史》，祝启源著《唵厮啰——宋代藏族政权》，牟一之主编《西宁历史与文化》等。2008 年底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丹噶尔历史渊薮》一书，是在《湟源县志》和《丹噶尔厅志》的基础之上，以专题的形式，描述了由先秦到 1949 年间的丹噶尔历史发展面貌，是目前所见对丹噶尔历史资料收集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还有发表在不同学刊上的相关学术论文十多篇。

然而，当今学术界对于丹噶尔藏人的研究处于一种起步状态，仍有许多不足。从所研究内容来看，学术界对于丹噶尔藏人的研究多为只是零星的，并未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综合研究。而且，除了极个别文章之外，基本都仅限于理论探讨，缺乏实地调查；从所研究的时间段来看，主要侧重于历史，对丹噶尔藏人的现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研究范围来看，研究面过于狭窄，大多局限于婚俗和服饰；从研究的侧重点来看，对丹噶尔藏人的研究仅仅是依附于对其他区域藏人的研究之下（如民和、互助及同仁等地区的藏人研究），忽视了将丹噶尔藏人作为主体进行研究；从研究的过程来看，存在一定的从众心理，观点多为大同小异没有形成一家之言。有些研究者虽然作了很多尝试，但多停留在简单的叙述或表象的描述，没有展开更深层次的挖掘研究，也未能形成较完备的研究体系，整体研究框架也同样处于空白状态。

由于学界研究的薄弱，可借鉴和参考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都是空白需要探索和创新，田野调查就成为了主要研究方法。笔者对丹噶尔藏人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共入点调查约 70 余次，累计调查时间约有 500 余天，积累了大量的调查资料，为全面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奠定了基础。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多学科多方法的交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运用，如，使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主要为入户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个案调查、问卷调查等）对丹噶尔藏人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控制、经济状况，婚姻、生育、家庭、丧葬、宗教文化等作了详细的实地调查；对丹噶尔藏人的族属、名称界定，丹噶尔及东科寺的沿革等则采用历史文献法作了纵向的描述；对经济发展状况、婚姻和生育、教育等研究内容运用社会学的统计法对所调查的数据、图表等作了大量定量分析研究；比较研究方法是研究婚姻、丧葬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主要方法，为了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和深度，在研究过程中，既通过文献资料作了大量的纵向比较，又通过调查

资料作了广泛的横向比较，纵横交错，步步深入。研究范围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各个领域，拓展了研究领域，填补了综合、系统的研究丹噶尔藏人社会文化变迁的空白。就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控制等民族社会研究的薄弱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同时为研究多维民族文化边界地带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实证素材。这种研究设计一方面可增强研究对象的典型性，展现事物整体面貌，另一方面还可以就相关因素对研究主题的影响，以及相关理论的归纳、阐释进行深入探讨。